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全文收录期刊

海派经济学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Shanghai School

第 13 卷 第 2 期，2015 年 VOLUME 13·NUMBER 2·2015

于金富 孙世强 程恩富关于中国产权制度与经营方式的思想研究

曹和平 丁晓钦 唐丽莎 “中国模式崛起”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经济学家曹和平教授访谈

陈伯庚 陈承明 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春天

——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刘晓音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合作趋势

海派经济学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Shanghai School

学术顾问

刘国光 项启源 于祖尧 何秉孟 李成勋 杨圣明 吴树青 刘方棫
卫兴华 吴易风 周新城 胡 钧 魏礼群 丁 冰 张薰华 洪远朋
吴宣恭 谭崇台 陈 征 刘诗白 刘思华 高 峰 杨承训 杨玉生

主编

程恩富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部主任
顾海良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会会长

副主编

马 艳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
熊诗平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丁晓钦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秘书长
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振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
林 岗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逢锦聚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

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地区和国家为序)

左大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吴 栋	清华大学
胡乐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孟 捷	清华大学
余 碩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朱安东	清华大学
侯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 钊	北京师范大学
杨 志	中国人民大学	白暴力	北京师范大学
张 宇	中国人民大学	文 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	王天义	中共中央党校
王志伟	北京大学	郭 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陈 平	北京大学	董正平	首都师范大学
曹和平	北京大学	刘永佶	中央民族大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派经济学.第13卷.第2期:总第50期/程恩富,顾海良主编.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642-2186-7/F · 2186

I.①海… II.①程… ②顾… III.①经济学—丛刊 IV.①F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7006 号

责任编辑 汝 涛
 封面设计 张克瑶

HAIPAI JINGJIXUE

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 顾海良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webmaster @ 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2.75 印张 249 千字
定价:24.00 元

周 宏	中央财经大学	吴宇晖	吉林大学
冯金华	上海财经大学	徐传湛	吉林大学
马 艳	上海财经大学	宋冬林	吉林财经大学
顾钰民	复旦大学	丁堡骏	吉林财经大学
张晖明	复旦大学	谢 地	辽宁大学
周建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	焦方义	黑龙江大学
王朝科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李欣广	广西大学
刘 铮	上海大学	黄志亮	重庆工商大学
龚晓莺	同济大学	武建奇	河北经济贸易大学
何干强	南京财经大学	陈惠雄	浙江财经学院
李炳炎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任保平	西北大学
葛 扬	南京大学	荣兆梓	安徽大学
朱炳元	苏州大学	欧阳峣	湖南商学院
何自力	南开大学	刘子兰	湖南师范大学
刘凤义	南开大学	王秋平	江西财经大学
李家祥	天津师范大学	焦斌龙	山西财经大学
颜鹏飞	武汉大学	张丰兰	内蒙古财经学院
简新华	武汉大学	大卫·科茨	美国麻省大学
龙 斧	武汉大学	艾尔·坎贝尔	美国犹他大学
方时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艾伦·弗里曼	加拿大明尼托巴大学
方兴起	华南师范大学	西蒙·莫亨	英国伦敦大学
朱殊洋	广州市委党校	罗杰·塞夫特	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
李建平	福建师范大学	海曼·考普	德国《马克思主义通讯》
黄茂兴	福建师范大学	弗里德·施密特	德国慕尼黑大学
庄宗明	厦门大学	彼特·弗雷斯纳	奥地利维也纳科技大学
周小亮	福州大学	让·克罗德·迪劳内	法国马恩河谷大学
张 衡	四川大学	里卡多·贝勒弗尔	意大利贝加莫大学
蒋永穆	四川大学	亚历山大·布兹加林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
刘 灿	西南财经大学	伊藤诚	日本东京大学
丁任重	西南财经大学	大西广	日本庆应大学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	金炯基	韩国庆北国立大学
周 文	云南师范大学	梁春逵	越南国民经济大学
薛宇峰	云南财经大学	路易斯·费尔南德斯	古巴哈瓦那大学
许兴亚	河南大学	海因茨·迪特里奇	墨西哥都市自治大学
张东辉	山东大学	尼迈耶·阿尔梅达·菲罗	巴西乌贝兰迪亚联邦大学

主办单位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
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

支持单位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
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

目 录

特 稿

程恩富关于中国产权制度与经营方式的思想研究 于金富 孙世强(1)

专 访

“中国模式崛起”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经济学家曹和平教授访谈 曹和平 丁晓钦 唐丽莎(16)

论 文

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春天

——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陈伯庚 陈承明(30)

关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一些思考 石冀平(42)

发展型税制结构:一个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阐释 陈少克(55)

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周扬波(69)

《贝弗里奇报告》中的程序公平思想诠释及其对我国社会保障及

养老金制度设计的启示 汪洪涛 宋 欢(81)

“两种生产”理论的扩展及对我国人口新政的启示 甘梅霞等(94)

构建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基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视角 尹徐念(102)

“营改增”对企业盈利结构与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上海相关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 孙红梅等(113)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合作趋势 刘晓音(122)

利用外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龚晓莺(131)

关于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论战及评析 胡 莹 田 曜(150)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述评 李民圣(161)

综 述

新常态视域中的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热点

——中国社科院第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

暨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综述 许 敏等(174)

第八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研讨会

暨中国 SSA 理论研讨会 刘诚洁 赵治成(184)

CONTENTS

Feature

- Research on Cheng Enfu's Thoughts of Property Right
and Business Model in China Yu Jinfu Sun Shiqiang(1)

Interview

- Person Who First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The Rise of China Mode"
—The Interview of Economist Cao Heping Professor Cao Heping Ding Xiaoqin Tang Lisha(16)

Paper

- The Second Act of Political Economics
—To Innovate and Improve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Chen BoGeng Chen Chengming(30)
- Thoughts on "Market Determine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Predominant Role of the Public Sector Shi Jiping(42)
- On the Tax Structure with Development Nature:
A Theory Explanation in Marx's Economics Chen Shaoke(55)
- The Effect Caused by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on Labor Income Share under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Based on the Evidence of the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Zhou Yangbo(69)
-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hought of Beveridge's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Design of
Social Security and Pension System Wang Hongtao Song Huan(81)
- Expansion of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Theory and
Its Inspiration to New Population Policy in China Gan Meixia et al.(94)
- The Construction of Unified Urban-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ck of Social Security for Migrant Workers Yin Xunian(102)

The Study on Value-added Tax Reform Pilot Program to the Listed Company Profitability Impact

—Based on the Annual Data of Relevant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 Sun Hongmei et al.(113)

National Strategy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Liu Xiaoyin(122)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Quality of Foreign Investment Utilization ... Gong Xiaoying(131)

An Analysis on Marxist Theory of Interest Rate Declination Tendency and Its Debate Hu Ying Tian Xi(150)

A Review of Studies in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by Western Marxist Li Minsheng(161)

Overview

The Focu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f Economic The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Normal

—The Third National Marx Doctrine Economy Forum and the Beijing Youth Forum of Marx Doctrin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u Min et al.(174)

Seminar on the Eighth National Modern Political Economics Mathematical on China SSA Theory Analysis

..... Liu Chengjie Zhao Zhicheng(184)

程恩富关于中国产权制度 与经营方式的思想研究

于金富 孙世强

内容提要 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程恩富教授特别重视马克思产权制度与经营方式理论的科学理论, 在西方产权理论与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比较分析、坚持与创新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与构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营方式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对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制度与经营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 产权制度 经营方式

中图分类号 F091.349

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程恩富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理论。程恩富教授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继承与创新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 程恩富教授特别重视马克思产权制度与经营方式理论的科学理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制度与经营方式理论研究上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对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制度与经营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比较分析

程恩富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制度理论是以马克思产权理论为基础的。为此, 程恩富教授不仅对马克思产权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而且对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

收稿日期: 2015—01—13

作者简介: 于金富(1956—), 辽宁大学中国经济转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孙世强(1965—),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方财政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经济伦理研究。

(一) 产权结构与产权界定

程恩富教授首先对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中有关产权结构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程恩富教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产权学派的分析都基本肯定广义的所有权或产权是由终极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束,其内在结构可以有多种组合,如共有产权、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合作产权、原始公有产权、个体私有产权、古典企业式单一私有产权、公司式复合私有产权等。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广义产权结构中的终极所有权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或关键作用,收益权是终极所有者的经济实现;而在西方产权学派那里则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它一方面强调终极私人所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即承认终极所有权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又声称终极所有权归属不重要,只强调由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所构成的狭义产权关系的重要性。在产权界定方面,马克思产权理论认为,产权界定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从长期来看,它必然会牵涉到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里)并与社会变迁相联系。产权的界定是一个演进的过程,随着新信息的获取、产权主体力量对比的变化,产权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中很可能因为收入分配累积效应引起阶级分化并产生阶级斗争。在产权重新界定的阶级斗争中,法律体系也会发生变更,甚至会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变迁。相反,西方产权理论虽然承认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同时被博弈行为所决定,但其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一种永恒的先验的安排,否认经济权利上的阶级斗争对社会变迁的决定性作用。

(二) 产权与所有制

程恩富教授在对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进行科学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并提出了自己关于产权与所有制关系的独特的产权理论。

首先,程恩富教授批判了西方产权理论只在现象上兜圈子的严重缺陷及其原因。程恩富教授指出,西方产权理论家在论述产权问题时,总是把眼光停留在法权关系问题上而尽量不触及终极所有制层面。他们总是在产权—市场效率之间寻找逻辑联系,总是明显地带有或暗含着对私有产权制度和市场魔力的赞颂,认为市场能有效率地运行的唯一条件是:追求最大化的个人主体是自由的,能对激励作出反应,并能以他个人的自我利益管理有价值的财产。因此,对于进入市场的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来说,前者注定是滥用的,而后者则代表了有效率的财产制度。但实际情况却是,在私产制度下仍然会存在农业耕地流失和个人林场过度砍伐之类资源浪费问题。不过,他们仍然能找到理由,认为这是市场不完全和一些人的短视行为造成的。这显然是在“产权”与“市场效率”之间关系的现象层面兜圈子。程恩富教授揭示了西方产权理论之所以存在严重缺陷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法论作指导,因而只注意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表层,而没有深究在产权关系的背后还有什么因素在操纵着社会经济动态长期的演进趋势。

其次,程恩富教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基本特征与重大贡献。程恩富教授指出,与西方产权理论不同,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则显示出更为厚重的历史感以及触摸和洞察经济本质的深邃的哲学意识。在马克思的视角中,私有产权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其本身也必将成为历史的过渡性范畴。程恩富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法权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产权关系是生产关系或所有制关系的意志或法律硬化形式;现实的所有制关系是先于所有权而存在的本源和经济基础,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和法律范畴。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行中阐明产权的起源和本质,将原始公有产权作为人类社会产权的最初形态,并把产权看成一个与生产力、经济和文化发展环境有关的历史性范畴。在他的产权制度变迁理论当中也隐含着制度变迁费用的比较,最终表现为是否推动生产力的提高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这一点,程恩富教授引用了诺斯的论述肯定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巨大贡献:“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有效率的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存所有权体系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紧张关系体现为发展的观点,堪称是一项重大贡献。”不仅如此,程恩富教授还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产权理论更为重要的原因。“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不仅贡献出深刻的产权理论,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产权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跳出资源私有制度给定的分析框架,重新确定‘产权—市场效率’的本质关联模型,私产制度的局限性便会浮出水面。”(程恩富、张建伟,1999)

最后,程恩富教授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对私有制的产权制度进行了科学批判。他分析了私有制产权制度的两大主要弊端:其一,私有产权制度必然涉及“异化”问题。在私有制中,“所有”被界定为一组私人权利,这是人类“异化”的根源。私有制使人们变得愚蠢和片面,人的感觉(肉体和精神)都绝对地受私有财产这种“异化”的支配而贫困化,变成一种追求占有私有财产的感觉和欲望。这样,人不再是一个全面的人,不再是一个对自己的生命本质全面占有的人。只有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才意味着一切属于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其二,财产占有的初始产权很可能是不公平的。财产的初始占有很可能遵循“先来者,先有权”的逻辑,而不管其通过何种方式(有可能是掠夺、偷盗或其他暴力手段),这无疑是承认飞来鸿运带来的巨大社会和经济意义,同时也说明一个人最好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出生得早,法律也似乎承认了这种“强盗逻辑”。

二、坚持与创新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制度,是程恩富教授产权理论的主要特色与基本观点。为此,程恩富教授不仅阐述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的重要性,而且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的可能性、现实性与创新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科学、系统而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理论。

(一)重要性: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才能促进共同富裕

在有关公有产权制度的论述中,程恩富不仅全面阐述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的重要意义,而且着重阐述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对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程恩富教授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了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别的最大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日益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原因”(程恩富、张建刚,2013)。既然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形成的主因是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么要改变当前的现状,必须重视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振兴集体经济,实行公私经济共进,改变“劳穷资富”,才能从根本上加以遏制。

1. 国有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承担重要职能

公有制经济在防止两极分化中承担着重要职能,只要我们保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贫富差距就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过于严重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否则,两极分化、社会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四个理由:第一,由于公有制企业中,生产资料不是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手段。劳动者主要根据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贡献的大小来参与分配,他们所得到的报酬的差距就比较小。同时与非公有制企业相比,消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经济剥削,他们可以得到比私有制企业中劳动者更高的收入。第二,公有制企业中的利润不是被个人所占有,而是为集体或国家所公有,这样有利于集体或全体社会成员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之外,上交的利润使得国家有更大的能力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更大的能力进行转移支付来帮助低收入群体,有更大的能力调控经济。第三,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产权结构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相较于按资分配的性质和方式,按劳分配的性质和方式更有利于维护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正义。这是由于,虽然劳动的能力、质量和绩效会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劳动者所得差距一般在几倍范围之内,而对资本的占有所造成的差距却可能

成百倍,从非公企业的内部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便形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第四,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对私有经济起到了一定的限制和制约作用,防止了财富和收入的过度集中。在国家调节有序的条件下,公有制企业使得市场竞争比较理性,市场价格比较平稳,避免暴利行业的长期存在。公有制企业的高工资也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进而增加非公有制企业员工在工资谈判中的能力。程恩富教授明确提出,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军工等关系经济命脉和高盈利的重要行业领域中,国有经济应该有“绝对的控制力”、“较强的控制力”,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这样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2. 集体所有制在促进共同富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对集体企业来说,它们的利润为集体所共有,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之外,可以直接改善本集体成员的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物质和文化生活,提高集体中全体成员的生活质量。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与村里的集体经济的壮大息息相关。凡是村里有集体企业的,村庄的整体面貌就真正过上了全面小康的生活。因此,要落实邓小平关于农村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两次飞跃论”的方针,积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集约经济,加强农村集体层的经营和管理,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的新路子。

(二) 可能性: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能够相容

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制度关系的错误观点,程恩富教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是能够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程恩富教授指出,综观人类近现代经济思想演化的历史,可以看到有两种思潮曾长期主宰世界经济运动:一种思潮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资产私有制相容;另一种思潮则认为,资产公有制只能与计划经济相容。以中国为典型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已同时突破了支配东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两种教条,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的崭新命题。可是,国内外仍有许多经济学家停留在传统思想领域,并不断抨击该命题,张五常就是其中之一。张五常说:“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而又不愿意行私产制度,那怎么办呢?这是经济学上一个极为湛深的问题。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形象,但又要私产与自由市场的经济活力,而这二者并驾齐驱,又要搞得像样,不至于挂羊头卖狗肉。说实话,我想不到哪一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能有可行的答案。”“一方面坚持共产的优越,另一方面支持自由市场,这其中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私有产

权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唯一没有经济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场价值。这种准则只有在私有产权下才可以有效运用。私有产权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的骨干。”“中国改革的要点当然是要把资产转为明确的私产，就是政府要尽量让资金落在私人或私营机构的手上。”“资产的转让权若不被大量放宽，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只可翻一两番，再多就不可能了。但若要让多种重要的资产自由转让，共产的形象就保不了。”

对于张五常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产权理论，程恩富教授提出三点质疑与批判：

第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存在根本的冲突。程恩富教授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问题的国际大论战中，米塞斯就曾断言：“因此，抉择仍然是：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市场经济。”这一观点遭到了奥斯卡·兰格和巴伦的严厉批判。后来，哈耶克又反驳声称：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才能保障个人自由和高效率地发展经济。张五常的基本思路不仅没有超出前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窠臼，而且添加了一些互相矛盾的事例和结论。中国的改革成功经验及部分经济学家已大大推进了兰格“模拟市场机制”的思想，也推进了前南斯拉夫“半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与英国亚历克·诺夫1983年提出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比较接近。在此基础上，程恩富教授提出了一个与诺夫和于光远教授有些差异的社会主义经济新公式：“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公有主体型产权结构+劳动主体型分配结构+国家主导型市场结构。这就是说，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由公有制主体型产权制度、按劳取酬主体型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这三项基本内容构成的，即两个主体和一个主导的‘三主制度’。它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解决公有与私有、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三大世界性基本经济矛盾的最佳模式，如果操作得法，完全可以优于西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程恩富，1995）。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私有主体型产权结构（制度）+资本主体型分配结构（制度）+国家指导型市场结构（制度）。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由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直接来经营，与要求自由经营的市场经济天性必然存在冲突，这也是西方某些国有企业效率较低的缘由。然而，只要依法实行国有民营，使企业真正按照市场竞争原则和效益极大化目标而自主决策、自由经营，那么它就不会同市场经济的本质发生根本的冲突，进而得以实现高效率。由此看来，在一个国家调节主导作用发挥得较好的社会里，公有产权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融合，而且可以比私有产权更适合现代市场经济，产生更高的整体效益。

第二，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究竟是何种关系。程恩富教授指出，资产私有制或私有权是市场交易和市场经济产生的先决条件毫无新意，自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以来的众多派别的经济学早已揭示过；撇开资产终极所有权，由资产

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和自由转让权组成的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和市场经济存在的先决条件，这显得不够全面。原因在于，由资产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和自由转让权耦合的产权，不一定只可采取“私人或私营机构”的“私有产权”的形式。它也可以采取合作组织、集体组织或国有民营组织的“共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的形式，甚至可以采取“国有产权”的形式，自然还可以采取多种“混合产权”的形式。换言之，产权的类型会呈现多样化，绝非“私有产权”一种。从数百年市场经济的变迁史来看，各种产权形式在不同层次上均能与社会生产力和市场制度互相依存、互相适应。那种主张只有私有产权才是“市场成交的先决条件”的论点难以成立。

第三，多种重要的资产自由转让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程恩富教授指出，以张五常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特别重视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在内的资产自由转让权，认为“若不被大量放宽，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只可翻一两番，再多就不可能了”。稍微浏览一下迄今为止的新中国经济史，这类缺乏经验常识的预言便不攻自破了。因为即使处于旧体制中，国民经济总量也不可能翻两番之后就永不增长。至于说到改革逐步允许资产自由转让保不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这又混淆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事实上，在全民和集体资产占社会主体的前提下，各种资产自由转让与社会经济性质及形态无关。

(三)创新性：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应当采取新的实现形式

程恩富教授不仅阐述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的可能性，而且论述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的现实性，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应当实现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的创新，采取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1. 国有制应当采用股份制的实现形式

程恩富教授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公有制主体型市场经济模式，而不是私有制主体型市场经济模式。因此，在迈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决不放弃含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内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而是要将公有产权与市场经济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一种以法人型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允许个体、私营和外资等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度发展，但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一定要占大多数或优势，国有经济一定要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体现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程恩富,2004)因此，把国有制和公有制贬为纯粹是可用可不用的经济手段，主张国有制不能与股份制相融合而必须放弃所有股份制企业的国家控股权等，都是不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本质的悲观思维，不利于在推行股份制改革中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

程恩富教授根据各国股份制的发展经验和市场运行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利用股份制的内在基本制度要素与基本措施。第一，建立以政资职能分离为目标的国资管理系统。这是推行股份制和重塑国有企业制度的大

前提。在该管理系统内设置三个层次：国有资产所有权的立法管理和最终监管归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机构；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行政管理归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局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商务管理或产权管理归各种国有资产产权经营机构（国有资产的集团控股公司、开发总公司等）。应当尽快颁布《国有资产法》，从根本上确立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性架构。在全国重要的竞争性行业分别组建若干个相互竞争的大公司或企业集团，并使各级政府的国资管理机构真正承担起国有资产或国有资本的出资者职能。第二，建立以公有法人相互持股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它是社会主义利用股份制的一个关键性制度要素。我国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利用股份制，让自然人持股或由私人资本构成的公众公司和机构持股及互相持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必否定能促进企业集团和自主经营的股份制的一般形式，而只需力避前苏联国家“股大卖小”的特殊私有化道路，尽管有学者视它为“新公有化道路”，并鼓动通过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来推行一种比俄罗斯更不公正的私有化。与国外自然人和私有法人为主的持股方式不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客观上要求持股以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或公有法人单位为主要方式（不是那种挂着股份合作制招牌的私有主体型企业），其股份应占大多数，其缘由在于那种个人和私有法人持股占多数的社会，无法根本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第三，建立以个人财产抵押为基础的经营者年薪制。这是集收入、财产、职位和荣誉等多重制约为一体的第三个制度要素，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股份制内涵之一。我们既不能大规模搞股份私有化和经营者大量持股，又要充分激励国有企业法人代表和主要经营者。在这两难抉择中，只能以此来模拟而不是照搬私有产权的机制与功能。搞活国有企业的关节点在于选好法人代表。必须废止传统的封闭式经营者任免方式，代之以市场型的人才招聘方式。可由投资者、企业内外专家和职工代表等组成招聘委员会，对社会上的应聘者进行经营方案和素质的多种考核；然后，被选中的法人代表须以一定数量的个人财产（金融资产、住房和借款等）为抵押来经营，其收入和聘期与经营绩效密切挂钩，并用多种指标控制可能出现的短期行为。第四，建立以党政互相兼职为特征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股份制要涉及企业内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会（经理层）与党委会、职代会、工会之间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股份制所要处理好的一个特殊矛盾。可以按照现代公司制度运行的规律和惯例及效率原则来界定各种组织的权利与职责，防止“组织摩擦”、“机制扯皮”和“人力内耗”而导致内部制度费用（组织费用）过高。执政党的成员在非政权性质的基层经营单位均应有行政岗位，党政干部要互相兼职，使党组织的领导直接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会等行政班子，在法人治理结构的机制内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既有利于改善和强化执政党的领导与政治思想工作，也有利于理顺国有企业内部多种组织的权利

关系,从而确立和完善公有企业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

2. 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可以采用各种新模式

程恩富教授指出,我国应倡导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模式多样化。除了南街村、刘庄等完全的纯粹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之外,还可以在扬弃过去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发展新的形态。例如,“两个联合”,即“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体现了新型集体合作经济的本质。新型集体合作经济组织的特征是:在产权制度上,劳动者个人所有权和共同所有权相结合;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与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相结合;在实现形式上呈现多样性,包括完全集体经济、以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相结合、以集体资产共有为主的集体经济、以劳动者“两个联合”为特征的股份合作制、以劳动者个人财产出资组建的合作制、由职工持股并有控制权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企业集团、由集体资本控制或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多种模式。以建立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为起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经过多年的实践,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股份合作、社区合作制、专业合作社等新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纷纷出现。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持股有限责任公司、由各级联社控股的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形式也大量出现。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传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逐步回归农民合作本位中得到发展。在各种新型集体经济形式中,应当着重发展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是以原社区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在不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把社区内集体经济财产部分或全部地折股量化到每个成员头上,并参照股份制的治理结构成立股份合作组织,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民主管理、按股分红。这种模式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再出让,是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混合模式。这种模式与我国许多农村地区将土地使用权流转给私人公司和私人农场不同,是走股权合作化道路,是合作社的一种特殊形式,既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又能体现共同致富原则,具有特殊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政府应该鼓励其发展,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

程恩富教授指出,必须落实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发展的“两个飞跃论”的战略思想和方针。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为此,程恩富教授主张要充分肯定和壮大“完全集体所有制”,因为经济学完全或纯粹意义上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归农村部分劳动者集体所有的一种公有制形式,